

读书有味

远去的小人书

屈泽清

一位画家朋友的工作室里，偶然见到他收藏的上百册连环画，整齐地码在书架上。随手拿起一册，封面是《三打白骨精》，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穿透泛黄的纸页，直接穿透到我心里来。一时间竟愣住了，指尖停在粗糙的纸面上，像触碰到了一个久远而温热的旧梦。

那是一个故事需要用用手去摩挲的年代。连环画又叫做小人书。我的童年就是被这些巴掌大的小人书撑开的。而得到它们的过程，如同一个个秘密的仪式。那时，父亲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要养活一大家子并不容易。幸好，母亲有一手蒸包子馒头的手艺，在学校或赶集时可以摆摊贴补家用。

白面的香气，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味道，也是我最隐秘的渴望。买书的钱，除了长辈或父母给的零花钱，还有一个谁都不知道的来源。我会偶尔从母亲的蒸笼旁，“借”一两个包子或馒头。趁她不注意，飞快地揣进怀里，那刚出笼的温热烫着胸口，一路小跑到集上的小人书摊。摊主是个眯着眼睛的精瘦老头，他瞟我一眼，不说话，接过还带着我体温的馒头或包子，从挂着的麻绳上取下一本小人书。

那交换是沉默的，却重如千斤。我拿起小人书，跑到僻静处开始读起来。馒头香气和墨印气息奇怪地混在一起，成了我最早关于“交换”的记忆——用实在的温饱，换取无的精神。

这样过了大半年。母亲偶尔会唠叨：“这面发得正好，怎么数着数着数量少了？”她看向我，我正埋头看书，她便叹口气：“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正是长身体

呢。”她从未当面问那些消失的馒头去了哪里，只当是儿子贪嘴。

许多年后，当我自己也有了孩子，在深夜里为他掖好被角时，才忽然惊觉。母亲那样一个为了一分一厘都要精打细算、对面对份量了然于心的人，怎么会真的毫无察觉？现在想来，她只是选择了用另一种方式，纵容了一个孩子关于远方的、笨拙的渴望。而我，捧着用馒头换来的《林海雪原》或《敌后武工队》，那混合着羞愧与满足的复杂滋味，至今仍能在舌底悄然泛起。

后来，集上的租书摊成了常去的地方。小人书用木夹整齐地夹在麻绳上，像晾晒着一个个五彩的梦。租一本旧书五毛，新书一毛。我和同学各租一本，蹲在梧桐树下交换着看，风翻动书页，也翻动着我们屏住的呼吸。慢慢和老头混熟了，他常附赠送我几本书免费看。

一次，我从老头的书摊上拿走几本小人书，书名已经忘记。约定三天归还，等我如约前去，书摊却不见了。老头常蹲的位置空空荡荡。我握着几本小人书在空荡荡的街角站成了一棵小小的树。

手里的书忽然变得很重——里面住着再也找不回来的黄昏，和一个孩子第一次认知到的且温柔的失信。

自己攒书的过程更是郑重的。每本买回的小人书，都要包上牛皮纸封皮，再用钢笔一笔一划写上书名和序号。到小学毕业时，竟也攒了百来本，装了满满一纸箱，那是我的王国。

放学后，邻家的孩子聚到我家檐下，石阶当椅，膝盖为桌。讨论声、争辩声，和着蝉鸣，把黄昏煮得沸腾。“关羽是武圣！”“张飞一声吼能吓退百万兵！”为张飞和关羽谁更勇猛，我们能吵得面红耳赤，

差点把石阶上的书撒到地上，又赶紧手忙脚乱地护住，仿佛护住的是活生生的英雄本人。说到岳母刺字，又会一同安静下来，仿佛能听见针尖刺入脊背的微响。

书页在无数双小手中传递，传递着故事，也传递着某种朴素而炽热的情感——关于正义，关于勇气，关于比乡村更远的远方。

十二岁那年，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们家要迁往张家界。行李精简再精简，母亲指着那箱小人书：“太重，送人吧。”我死死护住，最后还是妥协。只带走最珍贵的十几本，其余都送给了小我一岁的表弟。他当时乐得直跳，抱着纸箱像抱住了整个世界。

而我转身时，忽然想起那些消失的馒头——原来所有的交换，最终都是告别。母亲的馒头换了我的江湖，我的江湖又换成了表弟短暂的欢欣。而欢欣之后，是更长久的遗忘。

三十年后重逢，聊起童年，我问他：“那些小人书还在吗？”他愣了片刻，眼神茫然地搜索记忆，然后摇摇头：“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忽然释然。那些馒头，那些书，那些小心翼翼的借与还，终究成了我一个人的记忆。也好，就让它们完整地封存在一个人的时间里。

后来，电视屏幕越来越宽，游戏画面越来越炫，那些残存的小人书被我塞进床底，在流年中渐渐沉没。偶尔大扫除时拖出来，拂去灰尘，翻开一页，关羽的青龙刀依然冷艳，孙悟空的金箍棒依旧指天。

那一刻，所有与之相关的光会呼啸而来——馒头烫着胸口的慌，书摊前捏着硬币的手心，与伙伴争论时瞪圆的眼睛。原来它们从未消失，只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为我积蓄着对抗世事沧桑的暖意。

如今，我的孩子已不认识这些巴掌大的小人书。他指尖划过的世界，光鲜、迅疾、应有尽有。我有时想为他讲述那些纸上的春秋，却总在开口时，发现语言的乏力。原来有些风景，注定只能独自回味。

小人书真的很小，小到可以揣进口袋。可它又那么大，大得能装下一个江湖，装下历史的尘埃与星光，装下一个人最初对世界的全部想象。它没有声音，却让我们听见了马蹄与剑鸣；它不会动，却让我们看见了最生动的悲欢。那种需要耐心等待、用心攒钱、小心翻阅才能获得的快乐，那种与友人头碰头分享一个世界的亲昵，是如今指尖滑动间转瞬即逝的画面所无法给予的。

朋友看我出神，问我：“要不要拿几本回去？”我摇摇头。有些东西，适合留在回忆里供养。往后的日子或许不再有那样专注的阅读，不再有为一个人物命运揪心的夜晚，但那些从纸页间生长出来的精神筋骨——对英雄的敬仰，对道义的坚守，对故事近乎虔诚的热爱——已经长成了我的一部分。

就像母亲从未说过的馒头，它们以另一种方式，长成了我的骨血。离开画室时，夕阳正斜斜地照进来，给那些陈列的连环画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它们静静地躺在时光里，如同沉睡的婴儿。封存着一个时代的体温，也封存着我们这代人最初的、最明亮的乡愁。

那乡愁里，有馒头的麦香，有墨印的涩味，有一个孩子怀揣着整个世界的滚烫。而所有这一切，都已远去，远得像另一个星球上的光，我们只能隔着记忆的望远镜，看见它曾经如何明亮地燃烧，却再也感受不到那份确切的、烫着胸口的温暖。

读有所得

系统梳理鲁迅在韩传播与研究状况——评《鲁迅与现代韩国》

葛涛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昔杓的著作《鲁迅与现代韩国》中文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国内鲁迅研究界的关注。该书是第一本系统全面研究鲁迅与现代韩国关系的专著，代表了当代韩国鲁迅研究的学术水平。与此同时，其中文版的面世对于促进中韩两国鲁迅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也具有积极意义。

《鲁迅与现代韩国》对鲁迅在现代韩国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将鲁迅的作品翻译成朝鲜语，并开始研究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柳树人、李陆史、李明善等都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20世纪20年代—40年代，鲁迅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研究也被称为韩国鲁迅研究的前史，但相关情况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性研究。洪昔杓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的报刊文献中搜集史料，以时代为序，选择对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作出贡献的代表性知识分子进行个案研究，遴选出20世纪30年代的翻译家梁白华、记者申俊彦、教授辛岛尧、作家李陆史、批评家丁来东和金台俊等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鲁迅与现代韩国》分析了梁白华《阿Q正传》译本的特点和价值，剖析了丁来东和金台俊鲁迅作品研究的不同路径，梳理了《东亚日报》驻沪记者申俊彦和学者辛岛尧两人与鲁迅的交往以及两人对鲁迅思想的传播与研究。《鲁迅与现代韩国》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分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韩国鲁迅研究的空白，而且对研究鲁迅作品与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也作出贡献。

《鲁迅与现代韩国》的另一特点是重申鲁迅作品在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洪昔杓是韩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鲁迅研究者中的代表人物，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强调：“于我来说，鲁迅文学并不仅仅是我深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媒介，更是我理解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文本。鲁迅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还是帮助我摆正学习态度的楷模，更是我的精神导师。”由此可见，洪昔杓将生命体验和追求灌注到自己的鲁迅研究工作中。在论及鲁迅在东亚的价值时，作者说：“真诚希望中国读者能通过这本书，了解韩国文人对鲁迅和鲁迅文学的热爱……鲁迅文学是‘仍旧鲜活’的文学文本，彰显着不竭的影响力。基于此，我认为鲁迅文本可以成为推动东亚各国关系，谋求中韩乃至中日相互理解和对话的精神资源，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宗旨所在。”洪昔杓是带着浓厚的现实关怀来撰写《鲁迅与现代韩国》一书的。

《鲁迅与现代韩国》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东亚各国鲁迅研究者携起手来，以鲁迅研究为媒介推动东亚各国文化交流。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书屋杂谈

湊澧山歌自赏

柯云 湘斌

我们湊澧山里人说：“山歌是泉水，不喝难止渴。山歌是神药，一天不唱喉咙就起蜘蛛窝。”山歌，又叫民歌。因为来自民间，通俗感人，引人入胜。湊澧山歌主要是指我们张家界地区，历来是汉族、土家族、白族、回族、苗族等多民族聚居之处，山歌因历史悠久、各民族相互融合，更为精彩动人。湊澧山歌具有超凡脱俗、幽默、直白和含蓄的特点，经久不息。本土知名白族作家谷俊德在论白族山歌时说：“山歌是人生的外延，也是心灵的抒发。”我们山里人的喜怒哀乐、忧怨悲愁从心底喷涌而出，发表于天地之间，弥漫在山寨村落，与日月相厮守，昭示人生的秘密。1981年秋，从大巴山走出来的著名诗人梁上泉，特地来湊澧采风。他说，这里的山歌与巴蜀的大同小异，但湊澧更有特色。其中中秘无法破译，只能永无休止地吟唱，从生命的开始唱到生命的结束。正如山歌传唱：“好比麻藤缠草鞋，老少一代传一代。”歌词不断提炼更新，歌声纵横交错，如经纬线编成的巨网，裹住了无数稍纵即逝的意念。梁诗人形象生动地说：“山歌将自己的百般情感汇集成一部有序无跋的鸿著，这部奇特的大书，而每个唱山歌的人都是作者，也是读者，并且都是出版人。”梁诗人说得好。我们读这本书用心不用眼，读这本书用血不用墨。这部大书不用书局和小摊出售，而用穿云裂石的嗓子，随着山风和流水飘出山外。山歌恰如山里男女迥异的性情。男人的山歌如雷破晓乌云、疾风过峡谷，阳刚之气横贯天宇；女人的山歌似清风拂柳絮，曲溪过幽林，阴柔之美荡漾碧空。男子求爱的山歌如登高望秋水，青松傲霜雪，热烈而惶惑。其唱山歌之多，堪称歌的河。可以说，男人都是王老九，女人都是刘三姐。湊澧山歌没有固定场所，只要进山或下地劳作，再或集会，就是歌场。当一个被称为好汉子的男人和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双双莅临人前，人生便走进了辉煌。此刻，两条生命的激流汇到一起，迤迤起伏汇入岁月的波峰浪谷之间。湊澧山歌之所以传承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多是以情爱为主题。男人一般直白和形象，如：“妹妹生得白又白，哥哥生得黑又黑。黑字写在白纸上，你看合格不合格？”又如“小小鲤鱼紫红腮，下水洒到上水来。穿过几多金丝网，绕过几多钓鱼台，无人求你我不来。”女子唱的一般都婉转含蓄，如：“大路上面起灰尘，扇子遮面不遮身。遇到情人不敢喊，假装咳嗽咳一声。”如：“妹妹门前一口塘，手提竹篮洗衣裳。棒槌分心直望郎，一下打在指头上。睡在半夜疼不过，不怪棒槌怪不郎。”也有辣味的，如：“太阳出来照山坡，奴在房中织绶罗。刚好开动手脚，忽然飘来一阵歌。你是谁家浪荡子，唱出这种勾魂歌。害得奴家乱手脚，脚不着机手不着梭。打你肠脑你脑壳，奴家哪天认你出。罚你三生至于对骂的什么内容，就不言而喻了。湊澧源头作家向国平在试论《湊澧山歌》一文中说：“湊澧大山里随处可闻山歌声，此起彼伏，是山里人的生命意识在天与地之间幻化出的五色光芒”也是山里人一部古文化经典之作。梁诗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借用全国著名民间诗人王老九的一首平步的诗曰：“湊澧是个歌的河，山歌更比牛毛多。唱了一首产千首，三年未唱完一个牛耳朵。”

文学观察

屈泽清 汪城名

让阅读之光照亮全民成长之路

当《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将于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消息传来，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这部共6章45条的条例，从推广、服务、保障到法律责任，构建起全方位的制度框架，让“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的理念有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为全民阅读注入了持久动力。

全民阅读的核心价值，在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条例明确提出构建“全民覆盖、普惠高效”的促进体系，这一定位精准把握了新时代阅读的本质需求。阅读不应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成为全体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者，每个人都应能便捷地获取优质阅读资源。条例将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作为核心要求，正是要打破地域、年龄、身份的壁垒，让阅读之风吹遍社会每个角落。

条例的诸多规定充满民生温度，彰显了对不同群体的细致关怀。针对未成年人，既要要求父母履行言传身教的监护责任，开展家庭阅读、亲子阅读，也明确幼儿园、中小学、高等学校的分级培育责任——幼儿园侧重兴趣培养，中小学强化课程融入与书香校园建设，高校则注重拓展阅读与综合素养提升，形成了全链条的阅读培育体系。对于老年人，条例要求阅读设施提供适老内容、优化服务标准，鼓励老年大学开展阅读活动，体现了对老年群体精神需求的重视。而对实体书店的政策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的融合推动，既守护了纸质阅读的质感，又顺应了数字化时代的阅读趋势，让不同阅读偏好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每年4月第四周的全民阅读活动周，将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载体。阅读不仅是个人行为，更需要社会氛围的浸润与引导。当阅读活动与地方特色、行业特点相结合，就能走出同质化的困境，形成各具特色的阅读生态。想象一下，在古城街巷开展的传统文化读书会，在的技能提升阅读分享，在乡村书屋组织的乡土文学交流，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能让阅读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品。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条例的落地生根，需要各级政府主动作为，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协同发力。县级以上政府应加快完善城乡阅读设施网络，让阅览室、自习室等场所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文化粮仓；公共文化机构要切实履行免费开放义务，延长服务时间，提升服务质量；实体书店应积极创新经营模式，既是售书场所，更是阅读空间与文化地标，每个公民也应主动参与其中，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在墨香中涵养品格、增长才干。

全民阅读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施行是重要里程碑，更是新的起点。当阅读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当书香成为城市最浓郁的气息，我们的社会将更有温度、更有底蕴，我们的民族将更具创造力、更具生命力。让我们以条例施行为契机，主动拿起书本，在阅读中汲取智慧、滋养心灵，让阅读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让全民阅读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照亮个人成长与民族复兴的壮阔之路。



2025年5月17日，人们在上海徐家汇书店读书。新华社记者 陈翊 摄

文学之“家”，扎根在黄土高坡

张瀚漪 许晋豫

冬日的西海固，丘陵沟壑褪去绿装，裸露出土黄色。

一座灰砖红瓦的院落，静立在塬上。门前一副楹联：老林出硕果，深山有幽兰。

这是宁夏西吉县杨河村的木兰书院，一座扎根于黄土高坡上的书院。一位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西北汉子在门口招呼着：“咱这天冷，我刚烤好洋芋，快进屋吃！”

他叫史静波，木兰书院的创办者，曾是银川市一家报社的总编辑，前途大好。可他却做出了令很多人费解的选择：辞职、回老家、办书院。史静波似乎早已习惯疑惑的眼神，他掰开热乎乎的烤洋芋，笑着说当年辞职时那句“名言”——

“城里不缺一个总编辑，但乡村文化振兴缺一个苦行者。”

在热爱文学的史静波看来，西海固，曾以“苦瘠甲天下”著称，却孕育出了一片丰厚的精神富矿。

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里走出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家。三十多年来，他们中诞生出许多文学大奖获得者，包括“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儿童文学奖、骏马奖、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等，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就落户在西吉县。

“无论物质生活曾经多么艰难，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未放弃对文化的追求。”正是这份植根于故土的文化情怀，让史静波决定回到祖辈生活的地方，投身乡村文化振兴。

己当起小工，一砖一瓦在黄土坡上铺路。木兰书院创办伊始，在县里的支持下，史静波向全国作家发出邀请——只要来西吉采风，书院将提供免费食宿和力所能及的交通便利。

7年来，2800多名作家从各地奔赴于此，讲座、读书会、改稿会开在乡村小院、田间地头。杨河这个经济薄弱村变成了文学家园，作家们与“草根作家”结对子，手把手提升他们的创作水平。

在西吉，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作家。他们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更没有经过专业的文学训练，却怀揣着对文学最纯粹的热情。

为此，木兰书院创办了农民作家创作基地，聘请40多名农民写作者为驻院作家，累计创作散文、诗歌、小说等1200多万字，辐射带动了30多个村庄的300多名文学爱好者参与写作。

在木兰书院，随处可见“文学照亮生活”“文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的到访留言。

这其中，不乏质疑：这些“草根作家”或许一辈子也写不出精品，这样扶持意义何在？

史静波坚定回答：“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还要回归生活、指导生活。他们也许一辈子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但可以活成一部伟大的作品。”

西吉县六旬农民李成山，在放羊喂牛的劳作间隙，坚持写作近四十年。乡野生活的琐碎与孤独，曾让他萌生退意，几乎“沉默下来，放弃文学”。

得知此情，史静波多次上门探访，用诚恳的鼓励唤回他的初心。走进木兰书院，李成山被各地文学爱好者交流的热忱所感染，沉寂的创作火焰重被点燃。

不仅带头举办文学沙龙，更主动引导孩子们学习写作，用数十年的坚守与热忱，传递着乡土文学的温暖与力量。

史静波心中有一笔账，西吉县有近300个行政村，如果每个村子都能培养三到五名文学爱好者或写作者，就能汇聚一支千人数量的乡村文化振兴队伍。“之前在农村搞文学，常被说成‘不务正业’。如今风气焕然一新，读书写字的人多了，打牌打麻将的人少了。”

“这就是以文润心，以文化人，也是文学的社会意义。”史静波说。

文学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如何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从城里归来的史静波带着新思路新想法。他正和县里一起探索“以文养文”的机制，推动文学与研学、旅游、助农直播、心灵康养融合，全力将杨河村打造为文学旅游示范点，带动村民致富的同时，让文学收入反哺文学事业。

“洋芋，你们可能叫土豆，是西海固的特产，也是我们作品里的常见意象。我们就从洋芋讲起，用文学故事推广农产品。”史静波举着手里的烤洋芋说。

山绿了，人富了，风气新了。木兰书院通过20天的助农直播，销售农产品27万元。

木兰书院旁，有一片由200多棵红梅杏树组成的“作家林”，他们是来到书院的作家或文学爱好者认领的，每棵树上都挂着一枚作者的姓名和寄语。

“种下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也许50年、100年后，这里会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西北汉子笑了。

窗外飘起雪来，白雪轻轻覆盖黄土。而在黄土之下，种子静静等待春天。（新华社银川1月15日电）